

王西彦著



第一块基石

上海文艺出版社

121047
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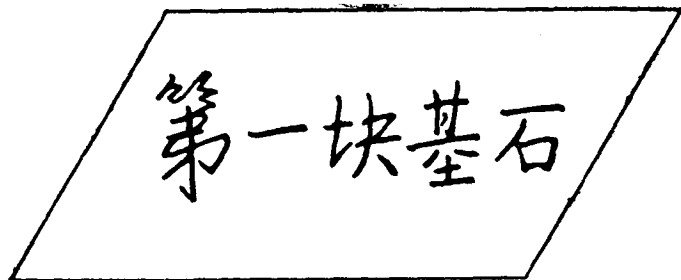


0008164



121047

W388



第一块基石

王西彦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

责任编辑：张有煌

封面设计：周 峰

第 一 块 基 石

王西彦 著

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

(上海绍兴路74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4.5 字数 320,000

1980年7月第1版 1980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17,000册

书号：10078·3160 定价：1.30元

目 次

第一块基石·····	1
从《药》看鲁迅创作的特色·····	15
论阿Q和他的悲剧·····	30
《故乡》和《祝福》——令人颤栗的回顾·····	59
鲁迅小说中的知识分子·····	77
关于鲁迅小说中知识分子问题的讨论·····	92
诗篇《伤逝》·····	106
论《故事新编》·····	119
关于《野草》的通信·····	153
读《朝花夕拾》札记·····	167
叛逆的和尚和复仇的鬼魂·····	183
纯朴的诗·····	191
不能忘怀的三折戏·····	200
血写的警告和“为公仇”的战斗·····	205
从爱国主义到国际主义·····	215
《二心集》和三十年代文艺战线上的斗争·····	228

涂饰和真相·····	250
肢节和全人·····	269
衡人的尺度·····	285
大海里的点滴·····	304

在“五四”的旗帜下·····	329
有关鲁迅初期小说作品的两三问题·····	361
鲁迅小说的艺术技巧·····	384
对鲁迅杂文的民族特色的几点看法·····	403

【附录一】

跨越自己·····	413
象这样的，就是一个伟大的人物·····	424

【附录二】

虬髯的悲剧·····	442
------------	-----

后 记·····	452
-------------	-----

第一块基石

五四运动时期新文化阵营的主要阵地《新青年》杂志，是从一九一八年一月(第四卷第一号)起，由共产主义的先驱者李大钊参加编辑工作的，那时正当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五四运动爆发的前夕。鲁迅的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就发表在五月间出版的《新青年》(第四卷第五号)上面。这是中国新文学伟大的创举。后来，鲁迅回顾当时的情形道：

凡是关心现代中国文学的人，谁都知道《新青年》是提倡“文学改良”，后来更进一步而号召“文学革命”的发难者。……在这里发表了创作的短篇小说的，是鲁迅。从一九一八年五月起，《狂人日记》，《孔乙己》，《药》等，陆续的出现了，算是显示了“文学革命”的实绩，又因那时的认为“表现的深切和格式的特别”，颇激动了一部分青年读者的心。然而这激动，却是向来怠慢了介绍欧洲大陆文学的缘故。一八三四年顷，俄国的果戈理(N. Gogol)就已经写了《狂人日记》；一八八三年顷，尼采(Fr. Nietzsche)也早借了苏鲁支(Zarathustra)的嘴，说过“你们已经走了从虫豸到人的路，在你们里面还有许多份是虫豸。你们做过猴子，到了现在，

人还尤其猴子，无论比那一个猴子”的。……但后起的《狂人日记》意在暴露家族制度和礼教的弊害，却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也不如尼采的超人的渺茫。^①

在这里，鲁迅说明了自己初期的小说作品特别是《狂人日记》，一方面受到欧洲大陆文学的影响，另一方面却有自己的特色。他举出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和尼采的《苏鲁支语录》（或译《查拉图斯特拉如此说》）的例子。果戈理的《狂人日记》，写的是一个可怜的小官吏，由于地位的卑微和生活的穷困，没有权利去爱上司美丽的女儿。他原是相信社会制度的庄严神圣和上司的公正廉明的，现在却看到生活里面的悬殊现象，看到“世界上一切最美好的东西，都让侍从官或者将军霸占去了”。因此，他开始怀疑“为什么人要分成许多等级”，并且想当一下将军，又把自己想象成西班牙皇帝。而当他最后被关进疯人院、受到冷水浇头的待遇时，就只好呼救起“妈呀，救救你可怜的孩子吧”来了。果戈理站在卫护“小人物”的立场上，对腐朽的沙皇官僚社会作了深刻的揭露和沉痛的抗议。不过，在等级制度十分森严的官僚社会里，一个“小人物”的爱情生活得不到满足，毕竟是一件平常的事情；而且，这位陷入绝望的小官吏的“报复”——从最初的想当一下将军到后来的想象自己是个西班牙皇帝——又是多么可笑呢？（在这一点上，果戈理另一篇也是描写“小人物”的形象的《外套》里面那个去剥“大人物”外套的小书记的幽灵，就显得勇敢得多了。）尤其是，狂人最后求救的呼声，虽然令人怜悯，也未免软弱了些。我们这样说，当然不是怀疑果戈理作品的深刻性，而是拿

^① 《且介亭杂文二集·〈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二集序》。

它跟鲁迅后起的《狂人日记》作比较，来说明后起的《狂人日记》为什么“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至于尼采的“超人”说，当鲁迅寻找武器来反对中国那些改良主义者的因循保守的时候，的确曾经利用过它；在有些作品里，例如《狂人日记》和稍后的散文诗《野草》的部分篇章，也的确曾经采用过类似《苏鲁支语录》那样的表现方法。尼采是十九世纪末期资产阶级的反动哲学家，他把“超人”定作历史和文化的创造者，认为人民群众只能听命于“超人”；他就以这样的学说，来反对哲学上的唯物主义和政治上的无产阶级革命，鼓吹已经进入没落阶段的资产阶级对人民群众的奴役意志。鲁迅虽曾利用过他的“超人”说，但鲁迅的思想和尼采哲学在根本上是毫无共通之处的。首先，跟尼采的轻蔑甚至仇视人民群众不同，鲁迅却竭力自觉地使自己成为人民群众的愿望的表达者；其次，尼采认为“弱肉强食”是自然的法则，把达尔文的进化论引导到为剥削和压迫作辩护，鲁迅却应用达尔文的学说，反对剥削和压迫，为被剥削和被压迫者鸣不平。就拿《狂人日记》来说，里面有些字句，是跟尼采式的独白相似的，例如狂人说到人从吃人的野蛮时期变成了不再吃人的“真的人”，但仍然有一部分人还在吃人，“这吃人的人比不吃人的人，何等惭愧。怕比虫子的惭愧猴子，还差得很远很远”，等等。这里，很明显，鲁迅不过是借了狂人的嘴，对封建制度的野蛮不合理发出抗议而已；即使从中也可以看出进化论的观点，但跟尼采那种轻视人民群众的反动哲学，岂不完全是两回事情吗？应该说，在写作《狂人日记》时，鲁迅已经摆脱掉尼采“超人”说的消极影响了。

那么，后起的《狂人日记》究竟是怎样的作品呢？它“比果戈理的忧愤深广”的地方究竟在哪里？为什么又“不如尼采的超人

的渺茫”？——这就是我们要在这里加以探索的。

在五四运动以前，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虽然推翻了封建的专制政体，但已经跟帝国主义结成同盟的封建主义的黑暗势力，并没有根本铲除。当时，中国无产阶级还没有形成独立的政治力量；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双重压力下，领导辛亥革命的资产阶级又显得异常软弱无力。尤其是，资产阶级本身就跟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对人民群众（主要是农民）的革命力量又心怀疑惧。这样，辛亥革命的果实，很快就落到了充当帝国主义的奴才走狗的封建军阀和官僚政客的手里。这些封建军阀和官僚政客们，就利用中国固有的那一套封建伦常和封建迷信来愚弄人民群众，使原来就在封建主义长期统治下的人民群众，继续蒙受毒害。而鲁迅，在辛亥革命以前就反对过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稍后又反对过继改良主义的维新运动而来的关门主义（这是那些民族失败主义者用来自保的方法），锐敏地看出“维新单是皮毛，关门也不过一梦”^①，中国并没有因此摆脱掉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在辛亥革命时又一度满怀过希望，以为中国人民的命运有了改变的机会，但很快就发现革命的果实已经被封建军阀和官僚政客们所夺取，锐敏地看出“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其实并未为共和二字所埋没”^②，封建的“铁屋子”并没有打破。因此，他在绝望之余，就“用了种种法，来麻醉自己的灵魂”^③——实际上，他是在沉思，探索，寻求新的战斗。就在这时机，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爆发了，使他看

① 《热风·随感录四十八》。

② 《坟·灯下漫笔》。

③ 《〈呐喊〉自序》。

到了“新世纪的曙光”^①，中国的革命运动来到了一个新的起点，鲁迅也就投身于战斗的队伍，在“革命的先驱者”的号召下，写起遵奉“革命的先驱者的命令”的“遵命文学”^②来了——《狂人日记》就是“遵命文学”的第一篇，也就是为当时的战斗者助威“呐喊”的第一声。

在这里，有必要看一看当时中国知识界对待革命运动的不同态度。辛亥革命的失败，使中国人民陷入严重的怀疑和失望，因为资产阶级仅存外形的民主制度受到封建军阀和官僚政客的玩弄，显然不能挽救民族和国家的危亡，但又不知道还有别的道路可走。现在，十月革命回答了中国人民的迫切要求，指出了中国革命的正确方向，给了人民群众革命的力量和信心。知识界的先进分子，就开始做起马克思主义的传播工作，共产主义先驱者李大钊就在那时期接连发表了象《庶民的胜利》和《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论文。马克思主义影响的日益扩大，招引起知识界资产阶级右翼分子的恐慌和反对，那就是李大钊和胡适的关于“问题”和“主义”的争论。资产阶级右翼分子继承了前一时期的改良主义的衣钵，他们的代表人物胡适贩卖帝国主义的反动哲学“实验主义”，提倡“一点一滴的改造”，一方面自然为帝国主义服务，另一方面也就跟封建势力妥协。作为当时革命知识分子的代表，鲁迅既然曾经反对过辛亥革命前的改良主义，而且深恶痛疾于辛亥革命的未能“湮没”“中国固有的精神文明”，当然就站在资产阶级右翼分子的对立地位上了。他看到中国民族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欺凌压迫之下，走向沉沦死灭的绝境，感到极大的悲痛和恐惧。他认为，国内封建反动势力和封建腐朽

① 《热风·随感录五十九》。

② 《南腔北调集·〈自选集〉自序》。

传统，是阻碍民族新生的主因，所以他把自己战斗的锋芒，集中在封建旧制度和旧思想上。

关于自己写作小说的动机，鲁迅曾经明明白白地说过，是为了毁坏“里面有许多熟睡的人们”的“铁屋子”^①；关于写作《狂人日记》的准备工作，又说过“大约所仰仗的全在先前看过的百来篇外国作品和一点医学上的知识”^②的话。这说明了两个方面的情況。首先，他所要毁坏的“铁屋子”，当然就是中国的封建旧堡垒；以《狂人日记》开始的收容在《呐喊》和《彷徨》两个集子里的小说作品，它们所揭露和攻击的主要对象，就是中国的封建旧制度和旧礼教。鲁迅出身于一个封建大家庭，对封建社会有着长期的痛苦的经历，深知封建制度和礼教的弊害，正如他自己所说的：“因为从旧垒中来，情形看得较为分明，反戈一击，易制强敌的死命”^③。辛亥革命的失败所给他的教训和刺激，更加深了他对封建势力的仇恨。同时，鲁迅又是一个对中国历史有深刻研究的人，渊博的历史知识，使他透过涂饰和谎言，窥见了历史的底细，看到了人民群众在长期黑暗的封建统治下的悲苦命运。另一方面，就是外国作品特别是果戈理的《狂人日记》所给他的启发，以及他在学医学时所获得的关于狂人心理的知识，给了他创作上的方便。此外，也还有其他的原因。^④这样，鲁迅就采用了独特的形式，通过狂人的眼睛和嘴巴，不仅深刻地揭露了几千年来中国封建社会的真相，更指明了这种封建关系的现有状态，

① 《〈呐喊〉自序》。

② 《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③ 《坟·写在〈坟〉后面》。

④ 据周遐寿《鲁迅小说里的人物》中说，《狂人日记》里面狂人的模特儿是鲁迅一个患“迫害狂”的表兄弟。

从而表达出要改变它的决心和愿望。我们看到作品里面那个狂人在翻查历史时，从“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的历史的字缝里，看出“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这样记载着“吃人”的历史，有些什么证据呢？狂人不仅有他的记忆，还有他眼前的事实，那就是：“易牙蒸了他儿子，给桀纣吃，还是一直从前的事。谁晓得从盘古开辟天地以后，一直吃到易牙的儿子；从易牙的儿子，一直吃到徐锡林；从徐锡林，又一直吃到狼子村捉住的人。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还有一个生痲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这样的概括和揭露诚然是令人颤栗的，却是真实的。中国的封建社会，在“仁义道德”的锦屏绣帐的掩盖之下，一直干着“人吃人”的罪恶勾当，布置着一套“人吃人”的制度，维持着“人吃人”的局面，世代相传，已经习以为常了。正因为这样，在狂人翻看历史以前，就听到过狼子村的佃户来告荒时对他大哥所说的话——他们村里的一个大恶人，给大家打死后挖出心肝来炒了吃；在翻看历史以后，又想起了去年城里杀了犯人，被一个生了痲病的人用馒头蘸血舐。问题的可怕和严重，就在这里。揭露过去，就是为了控诉现在，作者给我们展览出“人吃人”的封建关系的全部内容。一边是古久先生、赵贵翁、何老头子和狂人的大哥；一边是那些“也有给知县打枷过的，也有给绅士掌过嘴的，也有衙役占了他妻子的，也有老子娘被债主逼死的”人们，自然还包括狼子村来告荒的佃户，还有他村子里给别人打死的“大恶人”——前者是吃人的人，后者是被吃的人。可是，“人吃人”的现象，除了发生在这种社会的阶级的关系里的，还有发生在别的亲属关系里的，那就是狂人自己和他被大哥所吃掉的妹子，而狂人的母亲却是站在大哥那边的，因为，“大哥说爷娘生病，做儿子的须割下一片肉来，煮熟了请他吃，才算好人；母亲也没有说

不行”。不仅“人吃人”的关系是这样复杂，那方式也很不同。在这上面，狂人是很敏感的，他看出那些吃人的人，有时是“鬼鬼祟祟，想法子遮掩，不敢直捷下手”；有时却“大家连络，布满了罗网，逼我自戕”。而且，即使都是象狂人的大哥那样“不但唇边还抹着人油，而且心里满装着吃人的意思”的同伙的吃人的人，装扮和嘴脸既不一样，“有的是看不出面貌，似乎用布蒙着；有的是仍旧青面獠牙，抿着嘴笑”；心思也各不相同：“一种是以为从来如此，应该吃的；一种是知道不该吃，可是仍然要吃”。但不管怎样，总之，只要是吃人的人，“他们一翻脸，便说人是恶人”，给自己的吃人勾当找寻理由；他们的共同特点是“狮子似的凶心，兔子的怯弱，狐狸的狡猾”，因此，他们“自己想吃人，又怕被别人吃了，都用着疑心极深的眼光，面面相觑”。……

看到这一切情形的狂人，终于向那些吃人的人提出了诘问。我们看他“日记”里面描述到他跟一个“满面笑容”的“年纪不过二十左右”的人的问答：“吃人的事，对么？”“不是荒年，怎么会吃人。”——“对么？”“这等事问他什么。你真会……说笑话。……今天天气很好。”——“对么？”“不……”——“不对？他们何以竟吃？！”“没有的事……”——“没有的事？狼子村现吃；还有书上都写着，通红斩新！”“有许有的，这是从来如此……”——“从来如此，便对么？”“我不同你讲这些道理；总之你不该说，你说便是你错！”我想，我们每一个读者读到这里，都会感觉到作者是在无情地揭露封建道德全部虚伪的本质。请看吧，那些吃人的人的逻辑根据只不过是“从来如此”；如果你再要追问，就只好祭起那个“你说便是你错”的法宝来了。可是，这样的法宝，已经到了它失灵的年代，所以狂人也终于敢宣告“要晓得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的真理，而且发出“救救孩子”的呼吁。这应该是

狂人的胜利!

为什么能够达到这一步呢?为什么能够从狂人嘴里发出这种胜利的声音呢?这自然跟当时已经来到的革命高潮有关,也跟作者对待革命现实和对待文学的态度不可分。经历过辛亥革命以后一段梦魇似的日子,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又面临着一个充满革命战斗的暴风雨的时代。第一次帝国主义世界大战期间,中国的民族工业有了发展,中国无产阶级的力量也更加壮大。十月革命的胜利,更是一个巨大的激荡和伟大的启示。新时代的幕序已经在中国揭开,人民群众已经在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曙光里觉醒过来。一个带着社会主义性质的民主启蒙运动的怒潮,正在波浪汹涌地向前推进。而鲁迅,也就是站在这个怒潮的前面,发出战斗的呐喊。他不是把自己的作品称作“遵命文学”吗?不是说在战斗时“当然须听将命”,而“那时的主将是不主张消极的”^①吗?他不是还说过,由于自己抱着文学“必须是‘为人生’,而且要改良这人生”的主张,所以小说的取材,“多采自病态社会的不幸的人们中,意思是在揭出病苦,引起疗救的注意”^②吗?——这一切,就是我们能够在《狂人日记》那么一幅阴暗凄惨的图画里,看到一些“亮色”的缘故。狂人的胜利,当然就是人民的胜利。在这里,狂人是一个封建社会的叛逆,一个“铁屋子”里的觉醒者。如果我们拿这后起的《狂人日记》和果戈理的《狂人日记》作比较,前者所包含的忧愤的更为深广,是显而易见的。且不说对旧社会旧制度的揭露和控诉的深度了,跟出现在果戈理笔下的狂人最后的软弱的求救声不同,鲁迅的狂人的

① 《〈呐喊〉自序》。

② 《南腔北调集·我怎么做起小说来》。

“救救孩子”的呼吁，毕竟是一种革命的号召。自然，我们不会忘记，后起的《狂人日记》比果戈理的作品迟了几近一百年，果戈理所遭遇的，又是沙皇俄罗斯残酷的反动势力异常猖狂的时期。这两个同名作品的不同，正是由于产生年代的不同。说到尼采的“超人”，因为它为当时日趋没落的反动资产阶级服务的骗术，它鼓吹的是愚弄人民的奴才哲学，跟鲁迅的《狂人日记》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东西，所起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作用，不仅在于前者的渺茫而已。

不过，我们在谈论《狂人日记》这种“亮色”的时候，也不能不看到作者在作品里所流露出来的思想上的弱点。狂人诚然是一个封建社会的叛逆，“铁屋子”里的觉醒者，诚然发出了“将来容不得吃人的人，活在世上”的宣告和“救救孩子”的呼吁，但他对他大哥那一伙吃人的人，却抱着可笑的幻想。他希望他们会自动地放弃吃人的心思，如果他们能够“去了这心思，放心做事走路吃饭睡觉，何等舒服”。他抱憾于他们不肯跨过这一条门槛，这一个关口。但他还是一再地劝告他们：“你们可以改了，从真心改起！”“你们立刻改了，从真心改起！”从这种地方，不是使我们好象听到了托尔斯泰式的口吻吗？在封建社会残酷无比的吃人的事实前面，这样的劝告是多么可笑！这是跟当时鲁迅世界观中的进化论因素有关系的。“我想种族的延长，——便是生命的连续，——的确是生物界事业里的一大部分。何以要延长呢？不消说是想进化了。但进化的途中总须新陈代谢。所以新的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壮，旧的也应该欢天喜地的向前走去，这便是死；各各如此走去，便是进化的路。”^①这是鲁迅同一时期的观点，是一种“和平进化”的观点。狂人的企图劝告吃

^① 《热风·随感录四十九》。

人的人“真心”悔改的幻想，当然就是这种观点的反映。问题是在，置身于一个革命战斗的暴风雨的时代，面对着社会改造的任务，这种“和平进化”的观点，立刻就会暴露出它的缺陷。事实上，鲁迅在参加革命战斗的过程中，很快就跨越自己，不断地舍弃掉自己思想里的弱点。我们看到，在写于刚好一年以后的另一篇小说作品《药》里，在革命牺牲者夏瑜的坟墓上，就出现了一个花环，预示着后来者的继续战斗；更在几年后那篇同是描写受难的叛逆者的《长明灯》里，那个被人囚禁着的疯子，却已经完全放弃劝人悔改的幻想，“只闪烁着狂热的眼光，在地上，在空中，在人身上，迅速地搜查，仿佛想要寻火种”，同时高声发出“我放火”的呼号。就在写作《长明灯》的时期里，在另外的文章里，作者慨叹于中国吃人肉的筵宴，从古代一直摆到现在，“因此我们在目前，还可以亲见各式各样的筵宴”，中国文明也还没有改变是“安排给阔人享用的人肉的筵宴”的情况，中国也依然是“安排这人肉的筵宴的厨房”，但立刻号召“扫荡这些食人者，掀掉这筵宴，毁坏这厨房”^①，而且主张“什么都要从新做过”^②，自然更不要说到了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在身经目睹了严峻的阶级斗争以后，更认为“现在倘再发那些四平八稳的‘救救孩子’似的议论，连我自己听去，也觉得空空洞洞了”^③。

现在，就可以来谈一谈对狂人的看法问题了。我们不应该忽略，即使《狂人日记》里面的狂人嘴里发出了胜利的声音，《药》里面的夏瑜坟上出现过花环，《长明灯》里面的疯子更是不妥协地在寻找火种和呼喊“我放火”，但他们岂不终究只是狂人和疯

① 《坟·灯下漫笔》。

② 《华盖集·忽然想到(三)》。

③ 《而已集·答有恒先生》。

子，只是寂寞的牺牲者吗？他们战斗了，受难了，牺牲了，但距离真正的胜利还很远，因为封建势力还是那么不易摧毁，也因为他们还是个人的孤军奋战。这是使我们读者深感惆怅的地方，也是作者严格的现实主义精神的表现。前面，我们说到作者在《狂人日记》里所以采用这种独特的表现形式，是受到果戈理作品的影响的；但也可能有别的更主要的原因，那就是当时作者还没有在实际生活里看见过这样的人物。不错，作者曾经有过这样的记述：“民国元年章太炎先生在北京，好发议论，而且毫无顾忌地褒贬。常常被贬的一群人于是给他起了一个绰号，曰‘章疯子’。其人既是疯子，议论当然是疯话，没有价值的了，但每有言论，也仍在他们的报章上登出来，不过题目特别，道：‘章疯子大发其疯’。”^①此外，也许还有作者那个患“迫害狂”的表兄弟的模特儿。不过，第一，章太炎先生并不是真正的疯子，而且到鲁迅写作《狂人日记》时，原来对章太炎先生的看法也许已经有了改变；其次，那个患“迫害狂”的表兄弟好象并不是真正的叛逆者。很明显，当时的鲁迅，并不在塑造正面的叛逆者的形象，不过是通过狂人特殊的精神状态，揭露和控诉“人吃人”的封建礼教和封建关系，并以狂人的受迫害指明封建毒害的深切，更以狂人的反抗表达人民的愿望而已。这跟《药》里面的夏瑜，虽然是影射秋瑾女士的，但仍然没有描写到他的出场，同样地是决定于作品的主题思想的。因此，当我们看到有人把《狂人日记》的主人公称为具有崇高品质和勇猛意志的普罗米修斯，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鲁迅先生自己伟大的影子”，或者赞颂他是一个“这样的热爱弱小，热爱自己的民族，热爱人类”的“多么使人敬重、佩服、热爱的英雄”时，总觉得这些过分热心的“研究者”，甚

^① 《华盖集·补白(二)》。